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以史为鉴】	《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前言	孙怒涛
【史实辨析】	“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 ——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上）	秦 晖
【往事非烟】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侧记	郑异凡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以史为鉴】

《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前言

• 孙怒涛 •

一、历史拒绝遗忘

文革，离我们将近有半个世纪了。

文革历史正在被社会所淡忘。

对于个人，选择“快乐”地遗忘还是痛苦地记忆，那是自己的权利，他人无可非议。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生生不息的后代，这是一件必须直面，攸关千秋的大事情。

现在，有些人筑起了一道厚厚的、绵绵的遗忘之“墙”，牢牢地、密密地、有时是选择性地把文革真相“围圈”起来，不许窥视记录；“掩埋”起来，不准追根溯源。

作为国民，我们的回答是明确而坚定的：历史，拒绝遗忘！

因为遗忘，意味着放弃对文革发动者、领导者、加害者的问责；

因为遗忘，意味着引发文革的体制性弊端不再被深究；

因为遗忘，意味着亿万文革受难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丢；

因为遗忘，意味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本书，是一群清华文革亲历者、研究者的集体记忆和思考，也是我们拒绝遗忘文革历史的高声呐喊！

历史拒绝遗忘，历史不属于遗忘！

拒绝遗忘历史，拒绝遗忘文革历史！

二、文集的几个特色

1、作者分属于当年各个不同的阶层或群体

清华十年文革，从1966年6月开始，到1976年10月结束，以1968年的“七二七事件”为标志，分为清华文革的前期和后期。

前两年的清华文革无疑是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作为那时期运动主力军的学生自然是这段历史的主要回忆者。老团与老四，当然不会缺席。作者中有小兵，也有头头。两位沉寂多年的著名“蒯派”令人惊喜地“浮出水面”。更为难得的是几十年来不现身影的老红卫兵中，也有一位重量级的总部委员参与到回忆反思的行列。当年的教师已近耄耋之年，他们对过去的记忆依旧清晰。遗憾的是，当年颇为活跃的干部群体，如今提笔回忆者寥寥，显得有点孤单。

清华文革的后八年是由军人主导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时期。表面上狂暴稍敛，暗地里浊流涌动。曾在鲤鱼洲“劳改”农场走“五七”道路的新老教师们，诉说着当年的不幸和苦难。在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上，显现有工农兵学员顽强抗争的身影！

有意思的是，一位当年才是初中生的清华子弟，记录了一个青涩少年心灵中的文革感受。

本书最年轻的作者是一位目前尚在学校读书的“小清华”。作为九零后的青年，他对文革的思考给我们这些老者以欣慰，为新生代树立了好榜样。

需要说明的是，每一位作者都很难说是当年或现今哪一个阶层或群体的代表。他们叙述的是个体的经历，有的经历比较另类，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是，这本由六十余位作者完成的集体记忆，足以反映文革年代清华园的政治生态和众生命运。

由于编者能力有限，清华十年文革中还有许多重大的事件没有在文集里得到反映，某些时段尚属空缺：如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梁效”写作组、“罗文李饶专案组”等等。有些小群体，如高干子女、武斗中的枪手、派战中的打手、教职工中的推手，都未能约到稿件。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只能留给以后的有心人来弥补了。

清华文革的回忆和反思，如果仅由几个派头头，几支笔杆子来写，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文革是全民参与的运动，那么对于文革的回忆和反思也应该是全民都应做的功课。鼓动尽可能多的人一起来回忆思考，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文集中，虽然某些回忆只是凡人小事，有些思考可能不够深刻，但它们构筑了文集的厚实基础，并从中涌现了众多的精品佳作。作者们参与文集的本身就是他们拒绝遗忘历史意识的强烈表达。作为亲历者和研究者，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尽了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

2、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专为文集而原创的

编撰文集的目的之一是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对清华文革历史的回忆和研究。仅把已经发表在各处的文章收集出版，虽然也有意义，也有影响，但作用毕竟有限。

文集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作者专为文集而原创的。一篇篇文章都是我们一顾再顾约来的不易之稿，一篇篇力作都是作者呕心沥血的创作成果。这七十余篇新鲜佳作，代表了当今清华文革研究的最新水平，是清华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给读者的悉心奉献。它的集中推出，相信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

3、反思与回忆并重

依编者之愚见，文革资料可以包括三个大类：

第一类是原始资料，即在文革年代形成的资料。文革资料虽然汗牛充栋，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些资料正在被岁月所淹没。巴金老人提议的文革博物馆，在他去世后那么多年依然毫无动静。这类原始资料是现代文物，只能被发掘，不可能再生。挖掘、收藏、整理、保存原始资料的工作已有人做了一些，有待继续努力。

第二类资料是亲历者的回忆。虽然几十年后的回忆可能会有缺损，会有差错，但依然是十分宝贵的。它留下了当年生动鲜活的时空场景，对原始资料所起的订正、解释、补充、完善作用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第三类资料是亲历者的反思。因为是亲历者，他们的文革经历、心路历程，他们的观点观念变化以及对现今的认知，于后人来说无疑是一份生动而宝贵的资料。尽管他们的反思可能会带有某些局限性，如时代局限、派性残余、记忆偏差、个人经历有限等等，但依旧宝贵。

随着文革亲历者的老去或离世，如果说第一类资料还能如发掘文物那样继续挖掘的话，第二、第三类资料势必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断绝。因此，当前尽可能多地留存这类资料就更显得重要和迫切。

4、对各种观点兼容并蓄

社会上对文革的态度有多少种，清华校友中对文革的态度也有多少种：既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既有彻底否定的，也有全面肯定的。

文集对各种政治观点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文集录用的基本要求是：（1）尊重事实；（2）平和说理；（3）条理清楚。我们没有把“观点正确”或“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作为录用的标准。

清华团四两派由唇枪舌战到血腥武斗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恶斗的结局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社会问题只能靠和谈、协商、妥协才能取得长效的解决。

我们提倡各种观点在文集这一平台上尽情展示。我们鼓励原属于不同派别的成员从不同视角进行回忆和反思。我们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辩和交锋，理解偶尔流露的一些派情绪，但不提倡点名批评（公众人物除外），不使用“五毛”、“汉奸”等贬称，禁绝人身攻击，力戒派性残余。目的就是要保持文集平和说理的氛围，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在对观点的评判、辨析上。

我们组织了两篇这样的文章：一篇是多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回忆，另一篇是多人对同一资料的不同解读。文集里还有一些文章曾在校友网上为征求意见发表过，我们选用了各种不同观点的跟贴附在其后。这类文章不仅形式新颖，同时彰显了包容精神。

实践民主始于足下。我们把贯彻兼容并蓄、倡导包容精神作为践行民主的第一步。当然，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还有不少遗憾。譬如，在我们校友中有一些持有肯定文革观点的，虽然我们坚定地否定文革，我们仍然非常想收录几篇肯定文革的文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如愿。

本书主编和顾问郑重声明：我们录用某篇文章，并不表示我们赞同文章的观点，认可作者的立场。事实上在评审稿件的时候，大多数录用的文章都有一部分顾问持否定的态度。文集录

用的所有实名文章（包括序言、导论、前言、后记等），一律文责自负。文责自负的含义是：作者对文章负责，文章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5、广义清华文革的概念

清华文革，一般是指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文革。这是狭义的清华文革。

清华文革对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外界对清华文革也给予高度的关注，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因此，文集所涉及的清华文革也就具有了广义的概念。

凡是清华人的文革经历和对文革的评述反思以及非清华人在清华文革中的经历和对清华文革的研究评论，都属于文集收录的范围。这里说的清华人，既指文革期间在清华的学生、教师、干部、职工，也包括文革前后毕业离校、在国内或海外的清华校友，还包括正在清华求学的在校学生。此外，一些不同身份的非清华人在清华文革中的经历，为文集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色彩；他们对清华文革的研究与评论，展示了崭新的角度、宽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

在文革中，既有非清华人对清华文革的领导，也有清华人在外地对当地文革的干预；既有非清华人深陷于清华文革的泥潭，也有毕业离校的清华人在外地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这些内容在文集中都有所反映。

三、板块介绍

《岁月印迹》

清华十年文革中，重大事件几乎年年都有发生，有好些事件的影响是全国性的。

这一板块的作者全是所述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忠实地记录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些兼及所想、所思。

无论记录的是大事件还是小片段，无论其收录价值是高还是低，只要是真实的，都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生态，再现了难忘的历史场景。

这一板块的作品大体上按事件发生的时序编排。有些时间跨度较大的文章，在编排上则比较随意。下面这几个板块，以作者姓名的拼音排序。

《人物春秋》

文革，几乎影响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

在这个板块中介绍了几位文革人物。当年他们可能是上层的大人物，也可能是基层的小百姓。从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可以看到，文革是怎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着个人的命运。

《亡灵祭坛》

据统计，清华文革期间共有 58 位死难者，其中包括在 1968 年 7 月 27 日“工宣队”进校制止武斗时遇难的 5 位工人师傅，但不包括毕业离校后在外地死难的清华校友。

文革死难者是最不幸的群体。我们要记住他们，不能让他们只留下一个名字，更不能只是一个数字。我们应该让后人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学习、生活、为人、家庭，以及同学朋友对他的印象，还有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最后因为什么原因、受过怎样的折磨，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了。正是这些确凿的、血淋淋的例证，让后人相信并记住文革确实在神州大地，在高等学府，在我们这代清华学子身边发生过、横行过、肆虐过、祸害过。

文革，是清华百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不堪回首的一页。我们坚信，无论还要等待几年，或者几十年，在清华园里必定会建立一座文革死难者的纪念碑。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率先在我们的心里竖起这座无形而永存的墓碑！

因武斗伤残而早逝的以及毕业离校死于外地文革的清华校友，同样都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

文革亡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人亡友，特设此板块以表达我们的沉痛祭奠。

《校园内外》

这一板块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是每一篇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这里既有非清华人参与了清华文革，也有清华人介入了外地文革。其参与的程度之深，介入的影响之大，是在其他单位里很难见到的。

《思辨研讨》

这是文集的一个重点板块。

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教育的、人性的视角，对文革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思考。

除个别作者以外，绝大多数作者都是文革的亲历者。亲历者思考文革，虽然不免会有一些局限性，但由于他们曾亲身感受过文革岁月的狂躁氛围，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有些人目前生活在海外，前后对照，中西对比，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视野是未曾亲历过文革的研究者所不能企及的。

尤其是，他们现已年近古稀，敢想敢言。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再也不会会有这些亲历者的思考了。因此，他们的思考尤为珍贵！

可以看到，各人思考的结果不太一样，有的观点甚至相当对立。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可贵在于，他们都是在平和地说理论道、评史观今。

对与文革密切相关的后文革时期的研讨与批判，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有一篇文章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中收集了几位非清华学者对清华文革的深度研究和精辟论述，在此深表感谢！

《资料拾零》

收集整理清华文革资料并非是文集的主要任务。但在集稿过程中碰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文革资料，不忍遗弃，本着“能拾一点是一点，将来总会有用的”想法，故而有了这个板块。

读者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原来捡拾在这里的不全是“贝壳”，还有“珍珠”。

四、封面上的二校门

与清华有缘之人，都会对二校门情有独钟。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它见证了清华的百年历史，包括十年文革历史。它本身的历史就是清华百年、文革十年历史的浓缩。

为了让后人记住这段难以忘却的岁月，我们将二校门选为文集封面的主图案，并以相机胶片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二校门的历史：

左起第一张照片是解放前的二校门。那时，周边还有围墙。围墙虽存，不挡“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扩延，成为养育清华学子心灵成长的信条。后来，围墙拆除，校园扩展。传统的清华精神却在慢慢销蚀，清华变成了一所培养听话出活工程师的加工场。

第二张是文革期间，1966年8月24日下午，12所学校的老红卫兵开进清华，推倒二校门。有人在升降机上用大锤砸向“清华园”。这是野蛮对文明的宣战，是党化教育酿成的残暴恶果。其实二校门早就在缓缓地“倾倒”，它此时徒具华丽的外表，实体已被“蛀”得千疮百孔。

庄重典雅的二校门倒塌不久，文革发动者的塑像原地竖起。这第三张照片是那样的突兀、不协调，凸显了文革时期的荒诞与反常。

文革结束，塑像移走。第四张是重建后的二校门。它风采依旧，受人景仰，但本质上只是一个仿制品。何日能接续传统，唤起生气？且待“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大学灵魂慢慢苏醒！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史实辨析】

“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  
——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上）

• 秦 晖 •

（编注：本文为《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序言）

#### ◇ 我们都是“六六届”

文革当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在表象上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一些研究者眼中，“学生运动”与学生身份的“红卫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观。而在曾经构成这一景观的人群中，孙怒涛先生他们这些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最年长的老大哥，我们这些文革爆发时刚进中学的“六六级（六九届）初中生”则是最年少的小弟。

与“六六届”中学毕业生（后来所谓狭义“老三届”中最高一届，就入学而言一般是初六〇级）当时几无例外地都滞留学校经历文革不同，该届的大学、小学毕业生与文革的联系差异很大。六六届大学毕业生该年大部分都没有按时分配工作而留校参加了文革，但也有少数离校参加工作进入了社会，不再卷入“学生运动”。至于小学，在1966年暑期这个通常年份“小升初”的时段，全国的学校都已停课，教学业务完全瘫痪，但是“升学”的手续则各地进展不一。有些省份1966年小学毕业生当时就没有进中学，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才进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广西，则还是按常规分配我们进了中学。

就上学而言，进了已经停课的中学和没进无甚区别，就“革命”而言就不同了。文革时小学虽然也有取代少先队的“红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奉命做戏。中学则不同，它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是“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加之无课可上，“革命”就成了我们这些人当时在中学唯一的“正经事”。此后在1967年全国中学基本都没招生，等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后恢复招生时，自主的“红卫兵运动”实际已经结束，原来的红卫兵得意的离校工作、甚至当官成了新的“当权派”，大部分失意的则被发配边疆农村，甚至被整被杀。虽然直到1970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前一些中学仍然有“红卫兵”存在，但那已经是类似此前共青团的官方“助手”，而不再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会是“造反派”了。所以在我们之后进中学的学弟们基本没有参加红卫兵运动。而我们这届学生（尽管是“一进校就停课，毕业时刚停火”、没上过几天课的所谓学生）成为参加过红卫兵的最低一届。虽然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前不久还被称为“新生”（因为当时我们不仅几乎没有进过课堂，而且红卫兵时代也没有比我们更“新”的一届学生了）的少年基本只是跟着高年级学长们当拉拉队，在红卫兵中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角色，但比纯粹的看客还是不同。所以对孙怒涛先生他们写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场感”的。

几十年后我在清华大学当了历史学教授，虽然主修的并非当代史，但是也写过一些有关文革的东西。而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当年在广西的经历还与清华文革有“交集”。

这起缘于导致清华造反派灰飞烟灭、同时也是全国文革史上重要转折点的那个“七·二七”事件：1968年7月27日几万名工人、解放军（后来得知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当时正在“武斗”的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封锁，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毛泽东遂于次日“召见”包括蒯在内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内的“五大领袖”从这天起全部从失势走向垮台，清华、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从此土崩瓦解。毛泽东派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后简称“工宣队”）完全控制了各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

#### ◇ 7.24接见与7.27行动：从广西看清华

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先生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说，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系，与当时的很多中央领导保持有可靠联系渠道，而且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与时任北京市革委负责人的谢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频繁的工作联系，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1）就连当时属于与蒯大富敌对的“四一四”派孙怒涛等人，对此也有同感，他们与蒯再对立，也不会相信蒯有胆量对毛公然抗命。（2）由于毛泽东在“7.28召

见”时一方面严厉训斥，一方面在蒯大富哭诉时毛也激动流泪，还明确声称在清华两派中他反对四一四而偏爱团派，并当面交代在场各领导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后还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只是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沟通有误，导致“历史因此改写”。

但我听到这里，就想起了对我当时曾经参加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来说很难忘怀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几天前的7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中央首长最后一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以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为起点，对“广西四二二”的大规模剿灭已经在南宁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这次接见其实是正式宣布对“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死刑判决。“接见”后不久，四二二的代表们便被全数扣押入狱。而我们这些没资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员后来读到广西当局广为散发的接见纪要时，无不感到五雷轰顶。记得一个同学当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话：“啊，我亲爱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这次历时数小时的“接见”中，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们异口同声，一面倒地严厉斥责广西四二二。除了谈广西的事外，斥责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向在场的四二二人员追查所谓的“清华—北航黑会”的情况，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这些处理国家大事的首长们一个个仿佛成了“专案组”的审讯人员，不仅声色俱厉、不依不饶，而且追问之具体、口气之武断令人惊讶。周恩来首先指责四二二人员“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康生点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会议情况“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在地写出来”，“你在会上怎么讲的，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陈伯达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周、康和陈三人都轮番追问“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吴法宪说：“你们‘汇报团’（按：当时各派来京人员正式名义都叫某某组织赴京汇报团）不向中央汇报，到清华、北航汇报，汇报什么？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周恩来最后要求四二二人员回去写交代，“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远没有这么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来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员被认定参与“黑会”者的总数）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3）

这份接见记录表明几点：1，“中央首长”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清华—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2，清华（当然是指“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位置。而且从反复点名追查清华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指责“清华、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清华）的语气看，中央首长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3，与会的“中央首长”很多，而且来自我们现在知道其间矛盾很大的各个派系，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团和林彪军人集团，以及超越诸集团之上的（也有人认为是自有一集团的）周恩来等，但他们这时在处理造反派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显然，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能够整合出这样的一致。

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谁还会觉得蒯大富那天到处打电话都碰壁只是阴差阳错的沟通问题？

#### ◇ 关于“清华、北航黑会”

那么，这四二二人员参与了的“清华—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24 接见在 7。27 之前仅两天，但接见记录公布、让我这样的世人读到则已经是在 7。27 事后。接见中周恩来说：今天讲的内容“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意指传给蒯大富这类“黑会”中人），我也不怕你传出去。”这显然是讲反话，接见后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广西人大概不可能给蒯大富们通风报信（且不说他们根本还不认识）〔4〕。我们现在知道“清华井冈山”是非常重视搞情报（所谓“动态”）的，但这两天他们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风闻了也未重视。直到现在，清华文革中人写回忆录虽未汗牛充栋也已经卷帙颇为浩繁了，7。27 也是这些回忆录经常提到的，却未见到有谁提及这件对清华井冈山似乎是相当致命的事。后来我曾当面问过蒯大富等一些井冈山要人是否记得有这么个会议，居然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5〕尽管其实毛泽东在 7。28 训斥蒯时就指责他和韩爱晶串联各省造反派，“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林彪接话：“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但是，事后无论蒯还是清华井冈山其他人谈起 7。28 召见，谈起他们垮台的缘由，大都还是讲搞了“百日武斗”、武力对抗工宣队等惹怒了领袖，几乎没人提到这个“黑会”。不但如此，后来从毛泽东时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邓小平时代正式判刑，列举的罪状中也没有再提这件事。

为什么？我想原因其实也简单：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们没当回事，一直就没往心里去。而“中央首长”们其实当时对事情的整个经过也已经查的一清二楚。首先，7。28 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6〕

其实不用韩爱晶解释，7。24 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他当时就说：“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尽管这个说法也不确切（见下文），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北京参与串联，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上访的造反派大会”，即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之所以拉上清华，那是因为在大会议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主席台。但我从未听过‘清华、北航黑会’的说法”；“回广州后，在广东省革委会全会上批判我时，省的主要领导传达中央领导讲话时，定性为‘北航黑会’。‘清华—北航黑会’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清华开的，老蒯参加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谨对各地造反派来北京，来清华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没有更多的讲话。7月17日的会是在北航开的。”〔7〕而根据 7。24 接见时四二二参会代表白鉴平所说，会议是 18、19 日开的，与武传斌 40 多年后的回忆有两天之差，应以白鉴平当时的说法为准。另一代表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8〕这也与武传斌的说法一致。

至于周恩来指为与武传斌一起成为“黑会主席”的朱仁，是 7。24 接见中被多位“中央首长”连珠炮式审问追逼得最紧的一位。据接见记录，当时他在追问下“转弯抹角、吞吞吐吐

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9〕但是，近年笔者采访他时，朱仁否认了“主持”之说，只是说自己发言介绍了广西的情况，并且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是在北航开的，没有在清华开过，如果清华也开了，那自己并没有参加。〔10〕

这个说法与当时作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钱文俊所说可以互相印证。钱文俊近年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但第一天通知他们到清华，却因为当时清华武斗，校园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会场，实际没有开成会，会是第二天在北航开的。有个清华的到场（钱说他不认识蒯大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讲了不少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全国性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清华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11〕

钱文俊说的这个清华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蒯大富。40多年后笔者采访蒯大富时，他对这个会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后来想起说是有这么一个会，他当时就害怕跟各省这些人混在一起，但碍于武传斌他们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文革和周总理这些首长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就断然否定了这个馊主意。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我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我就离开了。”〔12〕

40多年后各人的回忆有些细节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综合这些回忆和1968年当时披露的情况，基本事实大致已很清楚：1968年盛夏时，各省造反派都已面临严重危机（曾短暂得势的大都已经失势，从未得势的则面临更严厉的镇压），他们纷纷组团赴京“上访”。广东的武传斌就出头让这些难兄难弟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搞了个聚会。

#### ◇ 所谓“黑会两主席”

为什么是武传斌？因为他领导的广东旗派这时也处在转折点上。旗派在1967年3月曾与偏向“老保”的广州军区有过冲突，但毛泽东发出击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后，周恩来承旨专门飞到广东，于4月18日在广州钦封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其对手则是“保守”的，并要求广州军区支持旗派。我们知道，这一年北京曾多次隔空表态、乃至派出“首长”（如到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造反派，使之从逆境中咸鱼翻身，但由周恩来亲自去现场钦点造反派的还只有广东。旗派因此声名大噪。人们现在知道广州军区及其司令员黄永胜对旗派心里是反感的，〔13〕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1968年2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黄永胜是主任，武传斌是常委，两人关系一如北京的谢富治与蒯大富。

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后，黄永胜到北京官升总参谋长，旗派却与此后的广州军方及广东省革委主流关系恶化，这其实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由盛转衰是同一趋势。但与其他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如广西四二二）相比，旗派当时面对的形势尚不那么险恶，武传斌也并不甘心。他认为广东军方变脸是黄永胜离开の結果，而黄永胜还是支持自己的。于是便与另一位省革委会旗派常委邱学科一起到北京找黄永胜告状。到北京没能见到黄永胜（黄其实正要整他呢），却发现各省落难造反派纷纷来京上访，自我感觉尚不那么坏的武传斌便出头联络这些“造反派战友”开了那个会，无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势，并没打算成立什么全国性组织（会上辽宁与会者提出的这个建议并非原先所料）。远在南国的武传斌毕竟不如北京人那么敏感，不知道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北京开会总要有东道主，找的自然就是北京的“造反派战友”韩爱晶蒯大富们。韩、蒯尽管当时还风头十足，但经过两年的“政治经验”已经不是1966年时的“初生牛犊”，他们是知道禁忌的。韩同意接待武传斌，是因为武与他一样是省级革委会常委，

而且据说还有黄永胜支持，属于他所说的“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并不是朱仁那样的在野人士。尽管这样，韩仍然没有参加武传斌主持的会，只是提供了会场，出席会议的北航红旗成员侯玉山和祝春生据说还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外省人的过激言论。而这个情况康生也知道。（14）

就广西四二二而言，参加这个会议也是稀稀拉拉的，在京四二二成员有的只去了北航，有的只去了清华，笔者所知的与会者中，两校都去了的似乎只有白鉴平。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诬为“黑手”、周恩来指为“黑会主席”的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成员，而是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上京“报告情况”，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15）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员中朱仁并不在领导层，康生之所以盯住他，只因为他是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被认为有理论水平。而四二二“柳铁工机联”一位中学红卫兵此前写有一篇观点激进的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当时与湖南杨曦光（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清华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等都是中央点名的异端“大毒草”。康生仅以“中学生不可能看过《哥达纲领》”为理由，就一口咬定中学生写不出这篇文章，肯定有“黑手”代笔，而党校教师朱仁就是代笔者，也就是四二二中的“黑手”。其实，不要说中学生完全可能看过马克思已全文引录过的《哥达纲领》（16），就是没看过，当时的学生不少也从我国“共运史”宣传中知道“哥达纲领”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的结果，那篇文章不过是借此典故来表达其不愿与对立派“老保”合流之意，与《哥达纲领》文本的内容毫无关系，何以非得看过那文本才写得出来？更何况在南宁工作的朱仁根本不认识在柳州的作者。

正如北航的戴维堤后来所说：“现在看来，在所谓的北航黑会问题上，韩爱晶和北航红旗本来是没有什么错误和责任的一一如果讲理的话。第一，韩爱晶一开始就反对开这个会，他借病拒不参加，当时能做到这点，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国人有‘四大’自由，这是毛泽东支持和倡议的。群众组织头头聚在一起开个会，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发发牢骚，讲了几句出格的话，但没有密谋武装暴动，没有违反宪法的任何行动，凭什么叫‘黑会’？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亵渎。‘北航黑会’不是黑会，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样。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面前，有时候是很难讲理的，因为他们是‘神’。连韩爱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会当成了黑会，真是可笑之极！这件事情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是严重的。‘北航黑会’和清华武斗事件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最终导致他老人家作出了大决策。”（17）

北航如此，清华就更不用说。尽管“黑会”是武传斌张罗的，北航韩爱晶只是勉强接待了他，清华连接待方也不是，主要的会议也是在北航开。有的回忆说蒯大富在会上露了个面但没怎么说话，有的回忆说他讲的话是泼冷水。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清华与这个会的关系比北航更淡薄。武传斌与戴维堤都说他们听到的指责是“北航黑会”而没有清华的什么事。但实际上，从7.24 接见时周恩来指责“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吴法宪说四二二是“向清华、北航汇报”，其他中央首长也反复追问清华有谁与会、蒯大富讲了什么，直到7.28 召见时毛泽东指责的“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显然当局追究清华和蒯大富要甚于北航和韩爱晶。

另一方面，广西四二二只是受武传斌之邀与会的众多各省组织中普通的一个，既非会议的发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辽宁八一那样在会有特别敏感的发言。当时七三布告已经发布，广西屠杀正酷，北京的四二二人员尽管极感冤屈无诉，但恐惧远超于愤怒，已是待罪羔羊心态，哪里还敢挑头当什么“主席”？后来武传斌、戴维堤的回忆对四二二人员会上的表现也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当局却把四二二拔高到突出的位置，周恩来说四二二的人是“黑会”两主席之一，毛泽东列举的与会者头一个就是广西四二二。作为当时全国被镇压得最惨的造反派，四二二那时被“枪打出头鸟”，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就是针对广西颁布的，是全国第一个公开出动正规军队剿灭造反派的布告（以后才有针对陕西的7.24 布告、针对山西的7.28 布告等）。而7.27 工宣队占领（18）清华，就是打着宣传“七三布告”

的旗号。

## ◇ 7。27行动保密之谜

就在占领清华次日的7。28召见中，出现了这样充满杀气地把广西和北京相联系的话语：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爱晶：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生：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泽东：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泽东：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19）

这是迟到的蒯大富赶来之前诸位首长对北航韩爱晶的训斥。这些话的核心就是“造反”如今已经被禁止，“谁如果还继续造反”就要被镇压，“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广西四二二已经被描述成杀人放火的“土匪”、“国民党”、“歼灭”的对象（真相详见后述），而以清华、北航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几乎被当做四二二的后台，他们不仅窝藏“土匪”（“广西佬躲在你北航”），还“想控制全国运动”，加之林彪说的惊人之语：“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这明显与陈伯达所说的全国造反派开会成立“黑司令部”同义。

当时蒯大富人尚未到，谈话就涉及了蒯大富“骑虎难下”的问题。毛泽东宣称：“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在当时语境下，韩爱晶说蒯大富骑虎难下，有为蒯开脱之意，即蒯大富受制于人，身不由己。但蒯大富骑的什么虎？受谁的牵制？无非有上下两个可能。“上”当然不是后来讲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当时他们都与毛泽东一起喝斥韩、蒯等，而且言辞比毛还厉害），只能是说蒯“奉旨造反”惯了，一下子难以适应完全相反的、镇压造反的新圣旨。若如此，这个“虎”就是发布圣旨的毛泽东了，毛泽东自己还能“把老虎打死”吗？另一可能是指“下”，是说蒯大富想转向，他手下的群众不干，那老虎就是指他们。而毛泽东怒称要“打死”他们以便让蒯下来，显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可见，毛泽东如果说对“坏头头”蒯大富尚有一丝怜意，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则已杀气腾腾了。

另一方面，召见时大家已经知道占领清华时工宣队死伤惨重（以北京“武斗”的标准而言），但毛泽东对此却毫无所动。正如孙怒涛所说：“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战士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也没有对下属交代一句要他们高度负责地妥然做好善后工作的话。没有！统统没有！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要是他们（死伤者）知道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对蒯大富与对工人这样冰火两重天的态度，他们会觉得死得其所吗？会觉得伤得值得吗？”（20）其实，更过分的是这次召见中，国家最高三人的下面这段对

话：

毛泽东：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这岂止是没有“表示悲痛和哀悼”而已，“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自得之情是溢于言表啊。

在对蒯派群众和工宣队员双方都表现得很冷酷的同时，毛泽东唯独对蒯大富本人表现出很温情。虽然“召见”的主调是训斥，但与其他首长一味声色俱厉不同，毛泽东（一定程度上还有江青）训斥之余不但为蒯大富流了泪，还当面痛贬蒯的政敌“四一四”，表示两派联合仍要以蒯为主，还叮嘱臣下不要整蒯大富。尽管这一切后来都没兑现，但很多人尤其是蒯大富自己仍然觉得这是“挥泪斩马谡”，毛泽东对自己一手扶植的造反明星还是有感情的。

的确，人非草木，不能说毛泽东在拿原先的心腹“小将”祭旗时没有一点怜惜。然而这和“挥泪斩马谡”还是大有区别。且不说当年孔明“斩马谡”时，他那政治家的“挥泪”也有浓厚的作秀意味，但“失街亭”毕竟不是孔明的安排。而7.27采取这种派出数万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搞掉一个“黑司令部”的做法，蒯大富们会有什么反应，伟大领袖难道真的没有意料到吗？受命闯入的数万军人和工人徒手面对惊恐之极且拥有武装的蒯大富们会遭遇什么，挥泪的领袖也没有想过？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命令徒手的人海对有枪的被围困者“强行缴械”还要“抄家”，能不出“意外”？如果对蒯不打招呼是偶然，何以聂韩谭王等其他造反派也一概被蒙在鼓里？领袖挥泪训斥之余煞有介事地当面告诉臣僚不要整蒯大富，何以他不久还是身陷囹圄？如果是工宣队员的“意外”牺牲“改写”了蒯大富和“井冈山”的历史，那么没有抵抗工宣队的其他四大造反派头头为何也遭到同样命运？

近年披露的一些内情更令人吃惊。如当年海军清华军宣队的朱勇说：7.27当天清华的事他们也一无所知，次日即7.28才听说，并到清华参加了8341部队主导的占领。而这个海军军宣队本是早在2月13日就奉命进清华宣传制止派斗的，在校两个多月与两派都混得较熟。但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却于25日奉命撤出清华，撤出后并未解散，而是集中驻于宣武区待命，并一直与校内两派人员有联系，明显是准备再入清华的。可是，7.27当天的行动却对他们保密。把这些先前已经进校做过不少工作、熟悉情况、清华两派也都认识的人撂在一边，却另派三万陌生人闯关而入。这样决策究竟是为了什么？无怪乎采访者李仕林惊呼：“啊……，简直没想到，居然是这种情况。45年后，我才知道，太难以置信了。”（21）其实另有资料显示，7.27那天还是叫了几个海军军宣队的人“带路”，而且前一日还派其中一人（凭过去的关系）到清华团派总部取来清华校园地图以布置行动。（22）但诡异的是这几人对包括朱勇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军宣队同事守口如瓶，而取图者对给他地图的清华人也不吐一字。

聂元梓后来说：“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23）蒯大富和当时与他对立的孙怒涛也都认为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会发生惨案。但有趣的是他们都不认为这事是毛泽东的故意。蒯大富相信毛泽东的善意，孙怒涛如今其实是不信的。但他认为，毛对是否通知蒯大富的问题是疏忽了，他既不是存心通知也不是存心隐瞒，只是没过问这样的“细节”而已。但他又找材料证明毛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不仅决定发动、而且实际指挥了整个行动，甚至还“蹲在地上指点地图”，“哪个单位牵头，哪些单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参加，怎么进清华，现场哪些人指挥”都是由毛决定的。（24）与这些具体的细节相比，是否

对行动对象保密实际上关系到敌我判断，这难道还是“细节”吗？事实上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他“召见”时搪塞说：“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这叫什么话？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没打就是没打，什么叫“间接打招呼”？谁都知道那时要打的不是什么毛主席希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这种关于领袖“伟大战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关于27日三万人进清华出于毛主席指令，要求清华配合这种“战术部署”的招呼。这样的招呼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有过吗？显然没有。但毛这样说，也表明他知道不好解释。没有这样的招呼，发生“误会”几乎不可避免。濒临绝境的四一四固然不会抵制绝处逢生的机会，校园本来就一统天下无人挑战、也早就厌恶武斗的韩爱晶或许也不会反应过敏，但这种逻辑能适用于当时的团派吗？

而我们从7.24接见可以看出，起码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林彪麾下那几大军头都已把蒯大富看成敌人。毛泽东如无同感，难道他们能联合起来对毛设局？朱勇等人提供的信息也显示那时对7.27行动的保密何等严格。其实，对那些被指为先于中共召开了反对派“九大”、窝藏各地“土匪”、甚至要联络各地“土匪”组织“黑司令部”以“控制全国的运动”的“造反”者，这样应对难道值得奇怪？当然，正如韦国清未必真信他手下编造的“反共救国团”领导“广西四二二”之说一样，毛泽东与中央首长们也未必真信关于清华造反派的上述离奇说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英明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如今已经“轮到小将犯错误”了，他们不犯行吗？至于毛召见时对蒯大富的怜惜和挥泪，不能说完全没有一丝真情，但政治纸牌屋中毛唱白脸别人唱红脸的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就在这场召见中毛不是还大讲刘少奇的病情、显示他亲自过问“救活”刘少奇吗？承蒙领袖如此关心的刘少奇此后还活了几天？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中死去的？

◇ 广西“处遗”披露的事实：为什么“制止武斗”后杀人更多？

无论如何，经过7.24接见和7.28“召见”，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广西文革和清华文革搭上了关系。但是广西造反派与清华造反派的遭遇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了。

前面提到7.28召见时毛泽东等人大骂广西四二二杀人放火。这件事到了改革时期的1980年代已经有了官方的平反结论：“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25）炮击起火。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广西联指却宣传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街道民房”。（26）当年7.28召见时林彪就此事骂四二二是国民党：“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长征时的情形且不论，可笑的是现在事实证明：1968年在广西“用此计”的恰恰是林彪支持的共产党官员韦国清及其御林军。

而工宣队进清华宣传的“七三布告”，也已经在广西被否定。1983年5月13日广西区委发出《关于对“七三”布告重新认识及对外表态口径的请示》，并于5月2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该文件称：“当时中央发布布告是为了防止大规模武斗，但布告本身确实存在错误，主要是把当时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调动了军队和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大量乱杀人的后果。”文件提出，即使为了安定团结在公开场合回避提七三布告，也“应当把七三布告的问题在适当范围内讲清楚”，并开展平反纠错和追究特别严重的大屠杀责任的工作。（27）事实上经中央指示后广西不久就不再“回避”，而是公开了这些“问题”，按官方的说法：“从此，压在人们头上长达十五年之久的‘七三布告’才得撤销，‘文革’中八万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28）

即便据1980年代“处遗”（29）时官方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中最小的一个数字（30），文革中广西也有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七三布告”后的镇压就死了49272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的58.3%。如以革委会成立为分界，则革委会成立前（即包括广

西四二二这类造反派能够“作乱”的整个时期）死亡12457人，占14.7%；而革委会成立后（即剿灭造反派的过程中和造反派被消灭后）死亡71816人，占比高达85.3%。（31）另一个对比更为惊人：在这八万四千多死难者中，两派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而其余96%的死亡即80981人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

官方“处遗”文件称：“从以上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文革’十年期间（1）广西杀人多是在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2）杀人多是在非武斗情况下，被个别或集体加以杀害的。”（32）

官方文献还指出：“《七三布告》下达后的杀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区文革期间死亡人数11918人，（其中）在《布告》后死亡的9087人，占死亡总数的90%左右。宾阳县由于县革委主任、（驻军）694师副师长王建勋等积极贯彻《七三布告》，仅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十多天里，就打死逼死3681人，占该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人总数的90.34%。南宁市在贯彻《七三布告》的很短时间内，仅围剿四二二据点解放路等就打死1558人，为《七三布告》前死亡人数261人的六倍。”（33）

发布《七三布告》据说就是为了“制止武斗”，但事实是这个《布告》导致了广西流血成河，死了比《布告》之前多得的人。至今为止宣传的文革图景，都是说“造反派”如何造成乱世，尤其是“造反派的武斗”为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处遗”资料以铁的事实表明：至少在广西，当权派和所谓“老保”镇压造反派，远比造反派野蛮和残暴得多（造反派当然也相当野蛮，这是我这个曾经的造反派群众从不想置疑的）。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屠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实际上无论广西还是全国各省，林彪垮台前绝大多数是军人主导，林彪垮台后“军政府”色彩明显弱化，文革前官员成为主导，但无论哪个时期，“群众组织”代表都只是跑龙套的，不要说造反派，就是如广西在镇压了四二二之后进入革委会的“老保”组织功臣虽然算是飞黄腾达了，也仍然是跑龙套而已。

（未完待续）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往事非烟】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侧记

• 郑非凡 •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成立于1969年1月，是当年全国最有名的“红旗”干校，各地五七干校纷纷来此学习取经。本人曾在此学习改造，但由于身份为“非革命群众”，有许多活动不让参加，因此只能写点侧记，留作历史的见证。

◇ 正名：是“五七学校”而不是“五七干校”

首先需要正名。它不叫五七干校，而叫五七学校。一字之差含义颇多。因为当时去学校的不仅有中办系统的干部，还有工勤人员，而且还有他们的家属，包括其妻儿（夫儿）和父母。如果叫干校，只能命令干部本人去，其他人可以不去，叫五七学校，那么干部、工勤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也在动员入校之列，所以在那里可以见到老头老太太，也可以见到小孩甚至婴幼儿，为此还办起了五七中学，编译局还有干部被派去教英语的。那时叫“人走家搬”，户口也得随迁，那架式是不让再回京城了。学校的所在地在江西进贤，学校总部在鄱阳湖的支湖青岚湖畔，那里的土地多为红色的土壤，在红壤山上建有分校。有一句惊心的话是驻中央编译局军宣队正式宣布的：“死在青岚湖畔，埋在红壤山上”，这就意味着到那里去不仅是锻炼改造，还要老死于此，去五七学校的人就算是被彻底处理了。

这所学校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中国素有株连的传统，“文革”尤甚。一人出问题全家连坐，而大官出问题，不仅其家属，而且其“身边工作人员”也在劫难逃。五七学校就有一批这样的被株连人员。刘邓这“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一倒台，其秘书、司机、厨师、警卫等等就统统被送到五七学校批斗、改造和交代问题。那时倒台的还有“彭罗陆杨”中的中办主任杨尚昆，于是中办五七学校就有一大批办公厅的领导干部以至小小的工勤人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复出，第一件事就是到中办五七学校要回自己的秘书。

来这里的还有人民大会堂的一批服务员，这可都是帅哥靓姐。他们是从农村挑选来的，不是像所说的是“五谷不分”需要学习改造的人，也许只是为了劳动力的需要，也许是超龄的缘故，才把他们下放来的。反正人民大会堂不愁没有服务员，农村里人有的是。这批年轻人是干活的好手，几乎什么都能干。

为增加劳动力还从江西的农村招收了三百名左右的青年干部到五七学校“学习”，编成第七连。他们大都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也是壮劳力。招收他们的时候说的是到中办五七学校培训，经过培训再回本地工作。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应招者甚多。不过等他们从五七学校毕业回家时，他们的岗位大多已经有人占上了一——国不能一日无主，农村的生产队也不能几年没人管理啊！

对五七学校的构成当地的老表也非常清楚，他们把五七战士叫做“五七哥老”，说别看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像叫花子，都是有钱的高干、大官。一个标志就是学校开办后当地的物价涨了，例如鲑鱼刚开始只有一两毛一斤，几年后涨成五六毛一斤，翻了好几番！

◇ 围湖造田

中办五七学校位于江西省进贤县，那里濒临鄱阳湖的分支青岚湖，从青岚湖割取一块湖区，围湖造田。我们去的时候进行学校革命传统教育，都说是第一批五七战士一筐土一挑土地筑成围湖大堤的。实际上，是江西老表那些民工事先挑土垒成的。有一次校里举办校史展览，可以清楚地看到江西老表挑土修大坝的照片。

围湖造出来的水田有几个大问题，一个是缩小湖区，造成生态危机。鄱阳湖现在湖区大大缩小，其中就有中办五七学校的一份“功劳”。其次，水田的淤泥甚厚，拖拉机耕田经常陷下去而“不能自拔”，不管什么时候，拖拉机一陷入淤泥，营区就吹哨子，叫大家去拉拖拉机，这时候的拖拉机就成为让人去拖拉的机器了，是名副其实的“拖一拉一机”。白天还好，如果是深更半夜，人们就得摸黑起身，顶着北风、踩着冰水去援救。第三个问题是大蛤喇皮特多，一脚踩下去就像踩在刀口上，马上鲜血淋漓。那时的要求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脚丫子割破了照样得下田。插秧并不苦，脚发炎化脓日子才不好过。

对围湖造田，一位五七战士写诗曰：“割取青岚一角，贴上红心一片！”还有两句不记得了，不过这“红心”肯定是贴错地方了！

◇ 编译局五七干校从石家庄改为江西进贤

中央编译局本来是归中宣部管的。“文革”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这个“阎王殿”被砸烂，编译局变得没有人管了。1969年底，决定由中央办公厅代管。

这时候编译局也正准备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去，本来选定的干校地址是在石家庄附近，这是驻编译局军宣队的部队驻地。第一批下放干校的人员已经定下来，行李已经发往石家庄。但突然接到编译局归中央办公厅代管的消息，随后中办就下达通知，编译局的干校同中办五七学校合并，发往石家庄的行李立即改道运往江西进贤。

中办五七学校有一大片水田，一年种三季水稻，红壤山上还有一片土地，种植水果，总面积相当大，因而劳动力非常紧缺。所以编译局一划归中办管，他们立即把这批劳动力调往自己的学校，编成第三连。这是知识分子连，在整个五七学校里非常特殊，学校给派来了指导员朱瑞真，他原是中办翻译组的成员，曾给毛泽东做翻译，大概因为编译局翻译干部多，就派他来担任指导员，还从中办的某单位派来一个姓祝的工勤人员担任连长，自然还有军宣队的代表，真正说了算的是军宣队，因为“斗批改”审查干部的工作是他们负责的。

◇ 独创的“非革命群众”帽子

我是编译局第二批下放五七学校的，1971年底到达进贤。“文革”中我算革命群众，属于局内不左不右的群众组织，没有担任群众组织的任何官职。在“文革”初期局内各派打派战，有大字报说我们编译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等的著作）是为中宣部“阎王殿”提供“反党炮弹”，对这种无端指责，打口水战显然不解决问题，我和同事殷叙彝进行了调查，最后由我就编译局编译灰皮书的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材料，寄给康生和中央文革，目的是请他们认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工作，但久久未有回音，不料1971年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康办把信转回来，说是“整康老的黑材料”，把我列入清查对象，关了五十多天。放出来后恢复自由身，也参加局内“马恩全集”的翻译工作。去江西的火车要在上海转车，上午到达上海，傍晚转车去进贤。在上海自由自在，我一个人还跑到城隍庙旁边的豫园待了半天。

车到进贤，一下火车，来迎接的军代表就让我们十来个在局内受审查的人出列，单独站在后面。来迎接的同志，同新来的战友热烈握手，走到我们旁边立即把手收回来了，收起的还有脸上的笑容。我们知道，自此以后要受管制了。

我们这同道的十来个人，有的是审查对象，有的是“历史反革命”，有的是“右派”。我是审查对象，中办五七学校给我们量身定做了一顶帽子，叫“非革命群众”，我们自称“非革”。这些人受审查，不能承认是革命群众和五七战士，但也不能说是敌人，所以就创造了一个“非革命群众”的帽子。这些人，在校内也属于不能乱说乱动的，行动受限制，例如不能单独去进贤城里购物看病，要去必须有革命群众跟随，有些会议我们不能参加。这是政治待遇问题，并非真的怕我们私自逃跑——要逃跑，北京上海要方便得多。后来我同其他单位的一些朋友交谈，他们都对“非革命群众”的称号感到新奇，国内还没有听说过其他单位有这种新奇的称号！这是中办五七学校的一大发明。

◇ 怎么累就叫你怎么干

中办五七学校干活的基本原则是怎么累就让你怎么干。学校的口号是，有汽车不用，用手推车；有手推车不用，用肩挑——可以用人力的决不用机器。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造人、锻炼人。校党委后来检讨说“对机械化和科学化不够重视”，实际上并非不重视，而是有意不搞机械化，用加重劳动来“改造”人，整人。

学校不管晴天下雨，都要出工，曰大雨大干，小雨拼命干。我们的劳动强度大大高于当地的老表，老表们遇雨不下地，冬天也大都不干活，而我们是一年到头顶烈日，冒大雨，顶北风地干活，没有多少休息的日子。只有学习和批斗可以让体力得到休息。

江西的夏天酷热异常，天气预报最高一直是只报到38度，但我们的实际感觉经常是40度以上。传说有规定，38度以上一律不报，据说高于38度就得停工，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能够享受停工的待遇，“战高温”，始终是学校的口号。“双抢”的时候，从北京派人来支援，也让他们来五七学校经受点锻炼，他们突然来江西，很难适应，中暑者颇多。

来这里劳动的人，不管是五七战士还是“非革”，过了一段时间往往出现心跳异常，传导阻滞。这可能同劳动强度大，得不到休息，饮食营养跟不上，气候条件严峻有关，显然也同这里的压抑的政治气氛有关。因此这里被叫做心血管病的高发区。有位厨师原先是为某首长做饭的，身子比较胖，高血压，夏日的某一天直接倒在厨房死去。

进贤还是高雷区，雨天经常是电闪雷鸣。有一次，我们冒雨在大田干活，突然一个炸雷就在我们旁边五十米左右的地方炸开，那块地立即出现一个圆圆的焦圈，我们命大逃过一劫。由于下雨也得干活，所以是无从躲避的。

我们的宿舍都拉一根长铁丝挂毛巾。听说有一天某连某专案组成员正在对走资派或审查对象训话，他指手画脚，手指碰上了铁丝，一个惊雷顺手指而下，将此人当场击毙。都说这是上天的“报应”，不过，这位挨雷劈者或许也是个受害者，训人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

劳动只是学校任务之一，其实学校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对大批干部的审查和批斗。校部以及其他各连这方面的活动，没有我们“非革”的份，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从后来校党委书记字光、校长曹全夫被开除党籍可以想象出来，整人整得多厉害。“四人帮”被粉碎后，大批下放五七学校的被审查批斗的干部恢复工作，在清算“四人帮”的罪行中自然放不过他们。

曾经有其他地方的干校慕名来我们这“红旗”五七学校学习取经，他们最后的结论差不多都是说：这所“红旗干校”的经验我们学不了！所谓“学不了”一是强劳动，二是整人。

◇ 连队生活片段

刚到学校的时候，吃得很差，只有青菜，很少吃到肉。连队有一个班负责种菜和养猪。连队生活如何取决于这个菜班。

养猪由编译局图书馆馆长杨威理负责，馆长变成了猪倌，都带“官”字，但“馆”“倌”不同了。当时他也受审查，所以也属“非革命群众”之列。猪养得不错，使我们从三月不知肉味变得每月能尝到一点荤菜。不过每逢宰猪，猪倌同伙房都有一番争执。养猪要报成绩，出多少净肉是关键，所谓净肉就是刨去下水、猪头的肉。因此猪头怎么砍大有学问，伙房要连头带胸脯往下多砍一些，这样猪头连肉就多一些，可用来改善伙食，而猪倌则要求少砍一些，这样出

的净肉就多一些，他的成绩也就大一些。从何下刀，就成为双方必争之地！其实这位猪倌想不开，少报点肉，对他不会有多少影响，不会因此改变他的身份，而让大家多吃点肉，可是功德无量的事！

宰猪是一项技术活。我们有一位彭老总，是在全国学解放军的热潮中从南京部队调来编译局做政治工作的，因为历史问题也属“非革命群众”。他常夸口说，宰猪最简单，根本用不着捆绑，只要几个人摠住猪的四腿，他一刀就解决问题。为见证他的这套真功夫，一次果然让他主刀。结果一刀下去，没有扎到心脏，猪惨叫一声挣脱摠住的手，跳下台板，带着刀，流着血，满院子跑。最后还是常规处理了，绑起来再下刀子结束它的生命。

局长王惠德是“走资派”，下放审查，亦属“非革”。连队耗子特多，大白天可以看见耗子在梁上跑来跑去。他逮住耗子，把一颗豆子塞入耗子的肛门，然后缝上，放它走。据说，几天后豆子发胀，耗子会忍受不住而去咬其他耗子。不过放鼠归洞是有的，它是否咬死同胞，则不得而知了。不仅如此，他还会杀蛇剥蛇，一些勇敢者因此而得尝蛇味（有些人是不敢尝的）。如果不是在五七学校，谁也不会知道这位经济学家竟有这一手绝活！

我的同行殷叙彝是研究五四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专家。他的问题只是因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用了一个当时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康生就此批示：“经验告诉我们，坏分子常常是借历史研究的招牌去进行反党的罪恶勾当。”这就成了大罪。殷叙彝高度近视，有力气但不善于体力活，因此常闹笑话。一天，他挑两筐土，用手使劲抓住扁担的两头，结果后面筐掉了也没有发觉，继续往前走。一般人在五七学校改造两年就回京，不知根据什么条例，他却呆了四年。

徐立群是著名翻译家，俄语很好。在五七学校给他戴的帽子是“历史反革命”，属“敌我矛盾”。这个问题实际上50年代就查清楚了，现在翻的是老账。有几天派我和他一起用粉碎机粉碎饲料。这是轻松活，老徐人也挺好，干了两天，我突然醒悟，一个“非革命群众”和一个“敌我矛盾”在一起干活，万一机器坏了，或者烧了，这是破坏还是一般事故，谁也说不清楚，还是小心为上，我向连部提出，请求换人。那是一个没事找事的时代，疏忽不得！

他的弟弟，也是著名翻译家，是五七战士。此公生活能力较差，不断闹笑话。他看见人家磨镰刀，都用手试试是否磨快了。他磨完也用手去试，人家是横着试，他却顺着刀锋直着试，后果自然是“一刀见血”！他需要松紧带，去到小卖部，问人家有没有橡皮筋，人家说没有，只好空手而回。

死人是常有的事。有的上吊，有的投水，有的病亡，真有一些人践行了“死在青岚湖畔，埋在红壤山上”的口号。有一位随儿子下放的老人，解放前大约是伪职人员，在学校受管制。他有事得报告领导，看管他的战士姓萨，排长姓樊。他每事报告必先喊“萨战士”，“樊领导”。结果大家开玩笑说他喊的是“杀战士”、“反领导”。老人大概受不了管制，最后上吊身亡。连里有一位女战士，是贫农出身，干活也麻利，不知为什么突然投河自尽了。事情发生在我来五七学校之前，不知原委。三连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所以派一名中办姓祝的工人来当连长，是来掺沙子，改造知识分子的。只知道，从那以后这位连长不那么张扬了，1972年10月调离三连。

◇ 农活与天灾

第三连约百十来人，种早稻100亩，二季稻50亩，晚稻50亩，三季加起来共种200亩地。这比北方的劳动要紧张和劳累得多。

来到学校后首先是分班。一个是牛班。刚开始时，认为牛班的人不需要大力气，出力的是牛，所以分去的是较弱的小个子。但一干起活来，就发现耕地、犁田，虽然靠的是牛在前面拉，但后面使犁使耙的人还是得使劲才行，所以以后分班的时候，就把有力气的人分去。大田班是负责插秧到收割等全部大田作业的，我就分在大田班。还有菜班，负责种菜，一个连队伙食好坏取决于这个班的工作。此外还有伙食班、医务室。起初医务室由局里下放的医生陈熙敏负责，等陈大夫期满回局，就找翻译毛著的陈行慧接任。她的俄文很好，曾经担任宋庆龄的翻译，60年代初调进编译局，“文革”期间闲着没事，自学针灸，给周围邻居治病，所以到了五七学校就当上了赤脚医生，一般的小病小伤就全靠她处理了。她还给周围的老表针灸治病，求治者不少，颇有口碑。她倒不管病人是敌我矛盾、“非革命群众”，还是五七战士，一视同仁。我曾送她两句：“欲问大夫何所有，一根银针穿心莲！”重一点的病，到校医室去，那里的大夫也就是中办医务室的医生。再不行就得去县医院或南昌市的医院了。

学校的主要工作是劳动。这里是南方，要种三季水稻。3月份开始育秧，这是技术工作、关键工作，是不让“非革命群众”参与的。4月初开始插秧。第一天插秧，我被分配去供秧。把秧田里培育好的秧苗，用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的铲子连土带苗铲下来，一片一片地装在竹筐里，然后由人左右两手各提一筐运到插秧手的后面。筐是拖泥带水的，相当重，又不能用肩挑。一天下来，到晚上总结的时候，军代表就点名批一批非五七战士，其中同那些敌我矛盾的人并列挨批的也有我，说我不把筐提起来，有时拖着。我很莫名其妙，这个活只能这么干，还能怎么样？当然此事没有什么好争议的，我也无权争论。后来看到电影《少林寺》，才知道要练就他们那种两臂向左右伸直，一臂举一桶水的本领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不过他们反正要拿我们这些“非革命群众”来做文章的，就像《水浒传》中那些“贼配军”，到了发配地不由分说，先打五十“杀威棒”再说。这是没事找事的年代，你是“非革”，就要找你的茬，不然怎么显示专政的权威。

其实，劳动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中学的时候，1950年国家困难，响应号召，干了一年的工读，留苏期间四个暑假有两个是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垦荒地干活度过的。回国后，赶上三年大饥荒，各中央机关为了解决副食问题纷纷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编译局的生产基地在城北小汤山附近的阿苏卫村，我们三天两头去副食品基地干活。所以一般劳动都难不倒我，没有干过的就是插秧了。

不久，连部分派我去插秧。插秧这个活主要靠腰功，知识分子长期坐办公室，弯腰插秧确实是苦差事，腰酸腿痛，直不起腰来。我倒还好，头两三天也同样腰痛难耐，但过了几天就慢慢适应了，对我来说就有点如鱼得水。把一板带泥的秧苗托在左手，然后用右手三个指头每次抓六七株秧苗插下去。一旦掌握要领，有节奏地一小把一小把地往下插，其实非常舒服。当你把一行秧苗插完站到田埂上，看着横竖对得整整齐齐的绿油油的秧苗，真有点完成一个艺术品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学校里最轻松而有意思的农活。熟练之后，我一天最多可以插一亩地，在连里算是拔尖的了。表扬当然是轮不上我，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需要的只是良好的自我感觉，能“自得其乐”。

不过也有乐不起来的时候。4月的江南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在江西也真怪，西伯利亚的寒潮频频来袭。记得4月10日那天竟然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这时候我们正在插秧，天寒地冻，连队的领导，无论是连长、指导员还是军代表，没有一个下令暂停插秧的。上头没有命令，我们只好坚持插秧。插秧需要灵巧的手指，才能准确地一次抓下六七株秧苗，手一冻僵，只能一大把一大把地把一块块夹着秧苗的泥团砸进田里。保护劳动力对他们来说也许无所谓，反正有“死在青岚湖畔”的说法，但是这种劳动不仅无效，而且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有“插下”的秧苗全都冻死了，几天后漂浮在水田上，只好重新耕田，重新插秧。

说起插秧，还得提一下一位姓张的军代表。他插得飞快，总是比战士们早好多到达“彼岸”，然后就在地头一边抽烟，一边考察他人的劳动表现。不过他本人的成绩是不能细看的，他身后留下的是稀稀拉拉、七歪八扭的秧田。不过谁也不敢说什么，要是“非革”的话可以批三天。他爱发表训话，一天安排除草，大家集合听训。他张嘴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一切新生事物消灭在萌芽之中……”听众只能暗笑。我们私下称之为“兵痞”！

插秧后接着是挠秧，这是用手去给秧苗根部松土，也是整天弯腰趴在水田里的作业。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成问题。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连里的一位最老的“非革命群众”，已经年近七旬的张报，竟一样跟着我们弯腰挠秧，他的手臂长，干得非常利索。张报清华出身，在美国加入美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怀疑他是美帝特务，把他送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劳改，在“文革”中又怀疑他是苏修特务，受到审查，成为五七学校的“非革命群众”。此公久经政治运动的“锻炼”，对批斗什么的早有准备，还没有被揪斗，就在家练习“喷气式”，说估计自己跑不了。就是他奉命领着我局的“牛鬼蛇神”唱“我是牛鬼蛇神”的“嚎丧歌”。1973年底在五七学校毕业回京，他做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云：“人生七十是初秋，一不退来二不休”——还有大干一场的雄心壮志！

还有两项田间管理工作。一项是施化肥和除草剂，把它们撒到大田去，这项工作比较容易，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另一项是杀虫，要背着几十斤重的农药罐一边打气一边喷洒农药。这是有相当危险的工作。灭虫用药叫1605，据老五七战士说，是当年希特勒在集中营杀人用的毒药，非常厉害。最近上网查了一下，这是广谱性有机磷杀虫剂，最初由德国人发明，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现在已经禁用。我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只能在喷药的时候谨慎小心，尤其注意风向，自我保护。那时候，一点环保的概念也没有，只知道农药一喷，田里什么青蛙、泥鳅、小鱼都没了，更不用说小小的害虫了。用这种农药来杀虫，生产的粮食是否可以食用，我们不得而知，那时我们只会嘲笑英国空气污染严重，泰晤士河水又怎样发出臭味，日本公害严重，水俣病怎么流行，一点也没有担心我们这里会有公害。那时学校的大标语是多生产粮食，支援越南的抗美斗争！我们吃的是自己生产的大米，支援越南的自然也是这种大米了。

经过九十天左右，水稻成熟了，该收割了。割稻是一项危险活，经常有割破手指的，甚至有人断去半截手指。好在我比较灵活，两年下来从来没有损伤过手指。

最后一道工序是送公粮，把晒好的稻谷装进麻袋，用绳子拴好，用拖拉机拉到粮库。扛粮食倒进粮仓是一项费力的技术活。男劳力扛着一百二十斤左右的麻袋，沿着窄窄的梯板，往仓库最高处走去，旁边的女同志迅速解开麻袋的绳子，以便把稻谷倒出来。如果慢了，扛麻袋的人在梯子上很难站稳，后面的人也得扛着麻袋等着。这种工作每次都少不了我们这些“非革命群众”。

连队还有一项较为特殊的技术活。江西上饶出产一种红石，这种石头石质比较疏松，容易开采和加工。五七学校有一批人专门在上饶负责采石，然后用火车运到进贤，分送各连队作为修建房子、猪圈等等的建材。运来的是长方形的条石，很不规整，需要加工成平整规矩的石头才能用于建筑。把扭曲多余的部分去掉，在四周边沿打出一条平整的线条。工具是一副铁尺，一把锤子，一个用钢条打成的平铲。锤子是圆形的，一不小心就会打在自己的手上，因此手掌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不过这个活儿很有意思，可以雕刻出好玩的艺术品，当然，这是不允许的。除了种田外，我不时还兼做石匠。

学校从杭嘉湖稻米之乡请来水稻专家蔡老师，指导育秧、施肥、除虫等等农活。他的把式真不错，穿一身白褂子下田插秧，上来衣服干干净净的，不带泥点。还有一位是当地的老农魏

老师，也指导我们的农活。他熟悉本地的气候农田条件，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清清楚楚。

1973年的冬春之交，进贤下冻雨。我在南方长大，从没有见过这种冻雨。雨滴在空中已经降到零摄氏度以下，落下来一碰到什么东西立刻冻住。落在电线上的冻雨越积越多，形成大冰坨，电线杆经不起重载，纷纷倒塌，这一来连队的电没有了，大喇叭的广播也没有了。没有电晚上早早地睡，没有广播，早晨的起床号也没有了，可以多睡一会儿，这真的不错。那时候信息不灵通，像这样的冻雨应当说是一个范围相当大的自然灾害，该有不少地方的电力中断，不过那时候，这算不了什么，是不当作一回事的，除遭灾地区其他地方也不会知道。要恢复通电，就需要重竖电线杆。此项工作交给有人大会堂服务员的那一连，我给他们当下手。这些小伙子真厉害，懂得操作，会干活。硬是把倒下的电线杆一根一根竖起来，拉上电线。终于使各连队通上电，大喇叭又大叫大嚷起来了，起床号还得把我们早早叫醒。

另一个大灾是发洪水。1973年6月底连日滂沱大雨，青岚湖水位上升到20.40米，大堤内的五七田全部被淹没，深处在2米以上，浅一点的也有1.5米。邻近好些村庄的大坝决堤，农民们自己修筑的大坝通常都比较单薄，经不起大水的冲刷。我们学校的大坝比他们坚固，不过也时有险情。

湖水离大堤只有5—10厘米，如果再下一周大雨就有决堤之虞了。位于低洼地带的六连全部转移，二、四连老弱病残转移。水位上升也危及我们三连，营房周围打上土堤。同时组织人员到大堤防洪抢险。连里成立防洪突击队，有队员25人，后减为15人。“非革”中有4人入选，此前“非革”连去邻村救火都不行，现在可以参加突击队了。我们冒雨挑土去加固大堤，那是整天泡在水里的作业，几天下来身上起了湿疹，其痒难忍。这湿疹完全是一种长期泡水的过敏反应，校医室、县医院都没有治疗的办法。后来允许我回家探亲，一离开进贤马上好了。

好在不久天空放晴，终于逃过一劫。不过危险还是存在。俗语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大堤如果有穴（管涌），不断渗水，就有决堤的危险，需要有人日夜巡查，防止管涌造成决堤。此时我虽为“非革”，但上面大概已经认为没有事了，所以派我上大堤去夜间巡查。每天吃过晚饭，我同另一位五七战士乘着床板拼成的木筏，划到对面的大堤去，迎着夕阳漂浮在水深一两米的水田之上，正是“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的情景。青岚湖起初还是一池浑水，经过几天的沉淀就变成清澈见底了。夜里巡查两回，检查管涌冒出来的水是清是浊，如果是清水，没有危险，如果是浊水，就意味着有扩大决堤的危险，需要采取措施，或者向连部报告。夜里可以用煤油炉做个挂面汤当宵夜，放几只从湖里捕捞的小虾，其味相当鲜美。躺在大堤上可以数星星，早晨可以跳下湖里游泳。这是我在五七学校里过的一段神仙日子！不过危险是存在的，一个当然是决堤的危险，遇到这种危险，我们只能发信号报警，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其次是发水后各种蛇类都往没有水的地方跑，大堤上很可能碰上蛇类。不过我们运气不错，还真没有碰上！

抗洪抢修大堤的壮举当时没有电影记录，也没有人想起拍照留念。时过境迁，校部觉得是个遗憾。我们回京后，听说校部找来专拍新闻纪录片的单位，在大堤上挖出一个缺口，组织一批五七战士“抢修”大堤，重现当年抗洪抢险的场面。不过我没有见过这个纪录片，具体情况就说不清楚了。

◇ 学习是最好的休息

学习不断，上面号召什么，就学什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知道为什么都被选上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当时简称《唯批》，说实话，这种书应当是学者理论家在书斋中研读的书，但在中国却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我在大学

读过此书的部分章节，现在乘此机会通读一遍倒也不错。对学习大家一点也不反感，一者可以读点书，二者不用干活，得到休息。

读书就要讲用。“非革”们只不过在小组里谈谈而已。不过革命的五七战士倒是需要好好讲用的。有一位本来平衡能力就差的五七战士，走路常常摔跤，他的讲用是，每摔一跤，走五七道路的自觉性就提高一步，每摔一个跟斗，阶级觉悟就提高一步，博得一片赞扬声。果然，一般下放进贤至少两年，有人甚至是四年才能返京。此公仅仅在五七学校呆了一年，就一个跟斗翻回北京了！

编译局是翻译机构，第一拨来五七学校的战士们却长期被禁止看外语书，大概打算让他们终老于此，“死在青岚湖畔”了。后来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允许学外语，读外语书了。但规定“非革命群众”不得学外语，只能读毛选和马列经典著作，以利于改造。过了一段时间才为我们“非革”解禁。

◇ 尾声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纷纷解散，中办五七学校却坚持办下去。据说中办主任汪东兴曾经发话：“我活一天，五七学校就要办一天。”几年下来，中央编译局该去五七学校接受改造的干部已经轮过一遍了，但学校继续向编译局要人，编译局只好启动第二轮下放。一些被改造的“五七战士”只好重返青岚湖，再走“五七”路。1978年汪东兴被撤销中办主任职务，这所学校才最终停办。

2000年6月编译局的部分同志重返进贤，回访当年赫赫有名的中办五七学校旧址。校部以及大片农田已移交当地的一个农场，三连所在地原先的三排营房有两排失火烧毁，只剩下北边的一排由农场的职工居住。围湖所造之田并未退耕，仍然种着庄稼。

近年网上有人要把此中办五七学校遗址改建成纪念馆，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不知倡议者是否知道学校的真实历史。本人倒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中办五七学校遗址办成“文革”纪念馆的一部分，展出当年五七学校的实情，以教育后人。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 原载《世纪》2015年第1、2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